

政治伦理化与党的执政伦理建设

刘小丰

[摘要] 执政伦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导向、规范和终极关怀的作用。执政伦理建设是政治伦理化的逻辑必然。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 事关党的执政, 事关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是执政伦理的基本要求, 加强执政党的道德建设是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执政伦理; 政治伦理化; 合法性; 价值

[中图分类号] D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08) 01-001-05

政治伦理不仅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 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 “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关怀的意义”。^[1] 遵循和不断探索执政规律,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历史的重托和时代要求。在此意义上, 作为政治伦理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探讨该问题,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执政伦理建设是政治伦理化的逻辑必然

1. 伦理政治传统与政治伦理化。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体现, 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主导和主要内容。执政伦理就是从执政视角切入, 以特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为依据, 研究执政党的道德属性和“执政党处理政治关系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2]。

“政治以伦理为基础, 具有道德价值”。^[3] “伦理道德不仅被视为政治的载体和基础, 而且被视为政治的目的”,^[4] 是政治伦理化的核心理念和逻辑起点, 而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作为基本价值原则的伦理道德, 就成为政治伦理化的表现。人类社会的政治进程,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伦理价值理念的政治外化过程。“在中西文明史的进程中, 政治建构对于伦理道德的依赖, 一直是个贯通的景观”。^[5]

“伦理政治是一种伦理与政治两类社会要素双向同化而构成的政治形态”。^[6] 政治伦理化是伦理政治的特质, 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政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具有悠久的伦理政治传统, 政治的伦理内蕴十分明显。从“修德配天”到“为政以德”, 都体现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混然为一体的, 可称之为伦理政治”。^[7]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中, “政治服从于伦理, 政治规范道德化”,^[8] 伦理内在于政治之中, 并给政治以伦理化的定位。儒家政治思想是其伦理思想的自然延伸, 体现一种“道义至上的倾向, 一种政治服从于伦理道德的倾向”, “儒家的政治选择仍然是一种所谓的‘内圣外王’的伦理理想主义的政治选择”,^[9] “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伦理, 统一于王道政治”^[10]。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 要求统治者首先进行伦理的自我约束, 树立自己的伦理道德权威, 然后实施道德教化。推行伦理道德是“圣人君子的政治使命, 伦理是社会政治之事”^[11]。“受命于天而德者居之”, 进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当然, 儒家的政治伦理体现的道德温情, 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由于伦理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 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社会关系的宗法家族社会中, 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更集中地表现为等级森严的社会伦理秩序和完整的等级伦理规范体系。总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 [收稿日期] 2007-09-14

[作者简介] 刘小丰,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政治伦理。 北京 100091

“伦理道德成为一个贯通各种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轴心、主线”，^[12] 伦理关系体系和伦理道德理念通过政治的伦理，成化为严密的制度化的政治架构和政治实践。

在西方，伦理政治的特质同样明显集中体现在对国家职能的伦理探求上。苏格拉底强调“道德是城邦政治的基础，而知识和教育是城邦政治的根本。”^[13] 亚里氏多德认为，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和目的，“国家是为全民谋福利，实现至善至美生活的工具，他把实现善看作为国家的目的”。^[14] 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卢梭从人的“善良意志”出发，试图建构以道德为基础的理想政治王国。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道德的整体，未来社会是一个按照“先验道德律”的要求，达到真、善、美之和諧统一的“至善”的理想社会。现代意义上国家、政党形式的诞生到其制度架构体系、政治运作原则和方式，无不贯彻着自古希腊形成、启蒙运动中成熟的基本政治伦理思想。

2. 政治伦理化与执政合法性。

在当今政治话语体系中，“政治伦理”和“执政合法性”或“正当性”是当前理论界的热点。“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是对权力的认可。”^[15] 伦理学的解释和论证是合法性的根源，是对“政治统治和政治行为在价值层面的可成立性和可辩护性”^[16] 最根本的判断标准。

任何一个政党要维持其统治，必须拥有充分的合法性资源。“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身俱来的”，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最初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基础之上。经过五十多年的执政实践，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资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证明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绩效方面给党的执政合法性打下的扎实的基础，成为合法性的主要支柱。用绩效证明执政合法性的作用是有限的。政治实践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政治不可能游离于价值之外，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伦理化的问题和要求无法回避。“合法性的危机是变革的危机。”^[17] 当前，中国共产党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伦理观的交锋，把合法性的辩护席摆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之上。面对西方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不断讨伐，面对民族文化独立性危机，面对伦理对政治影响日益强化的趋势和人类对伦理政治理想的价值预设和渴求，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强烈忧患意识的共产党人，必然要做出历史的抉择。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在世界上应居于何种地位，如何应对西方伦理文化对国内伦理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以何种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成为党的执政必需面对的问题，都对党的合法性提出新的现实要求。这既是个事关党的执政合法性，又是个事关民族合法性、国家合法性的根本问题。同时，国内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亨廷顿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政绩的困局”在中国同样存在，经济高速发展支撑的合法性无法满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合法性诉求。从社会价值标准的失范到信仰危机，从民众道德水平的境况到党内腐败现象，一系列涉及伦理道德的价值性问题给政治伦理化增加新的内容和要求。积极主动地应付并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党执政的逻辑必然要求。

伦理道德具有独立的社会批判功能，具有独立的价值内涵和价值追求。在当前全球化浪潮和国内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伦理道德的实践、推广和提升是执政党的伦理责任。“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能否以一个道德的，即先进性的政治组织力量领导伦理道德建设，能否建设一个伦理道德的国度，提升全民族的伦理道德素质，就成为最现实的问题。

二、道德文化建设是执政伦理建设的基本要求

1. 道德文化建设与执政使命。

党的执政是“一个政党通过合法的途径在国家权力中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国家权力将自己的治国主张贯彻于国家的政务管理过程中的活动”。^[18] 党的执政使命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共产党，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执政使命。这一使命意味着历史的责任，道德的责任，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

具有崇高的价值理想与追求，是党的先进性的标志。“政治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感化机构，它代表着最高伦理准则”。^[19] “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存在的执政党，具有‘引导社会思想潮流、致力于形成共同价值和文化的责任’”。^[20]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物质水平的提高，不会自动地或必然地促进社会道德文化的进步。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对滞后。在社会现实中，颓废的物欲文化盛行，许多人精神空虚，传统伦理价值体系走向崩溃边缘。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价值的多元化消解了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进入“意识形态终结”阶段，信仰危机弥漫整个社会，价值相对主义

大行其道，传统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解释力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中国是个伦理道德的国度，是具有悠久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也表现在道德文明的发达上。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立一个共同“善”的政治的国家，是执政的目标指向和永恒追求。“善”的国家是道德国民的集合体，是国家在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化。英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托马斯·格林认为，“国家既为个人道德完善创造必要条件，又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善提供了保证。国家是一种道德力量，是人们实现道德的必要保障。”^[21]国家的目的“始终是建设一种新型的更高级的文明，使广大人民群众文明和道德规范符合经济和生产结构发展的需要”^[22]。就是说，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是国家的最重要职能之一，党在国家的建设和管理中要主导社会道德建设的方向。“党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政治作用，它首先是道德教育的作用。”^[23]“教育是德治的本性”，在全社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具有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国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进而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构建道德的民族、道德的国度，既是一种伦理关怀，又是一种伦理责任。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是保证现代执政具有伦理内涵的实践基础”^[24]的基本要求，是“一项具有深刻价值立场的伦理承诺与伦理实践”^[25]。

2. 道德文化建设与党的领导。

“思想统治的职能本应由国家政府机器担负，是国家政府机器所担负的整个统治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26]从执政的角度看，党的执政要遵循政治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党负有道德文化建设的伦理责任，要主导道德文化建设的方向。从道德的文化属性和道德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来看，党的“领导”更符合客观要求，更全面地体现执政党的伦理责任和道德文化执政意识和能力。

“我们必须强调现代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方面的作用和重要性，因为政党的作为，基本上是制定与这种世界观相适应的道德和政治，可以说，政党起着道德和政治的历史‘实验室’的作用”^[27]建设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和普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充满健康向上、积极进取氛围的和谐社会，是执政是党的执政任务和现实要求。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特征，利益关系更为复杂。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思想意识，进而在它们之间，它们和执政集团之间，形成一个潜在的离散动因，最终挑战党的执政地位。在

此种情况下，如何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实现不同社会阶层的联合，从而获得最广大群众积极的同意和衷心的拥护，成为执政党亟待破解之题。道德文化是社会最基本的整合力量，是归属感和崇高感的来源。只有建立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才能使民有所信，有所立，有所求。这样，道德文化建设很自然地作为一个着力点，一方面承担着凝聚人心，形成不同阶层群体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进而起到巩固执政基础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执政使命，体现为执政党的道德伦理关切。

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葛兰西认为，要实现人民群众对执政的自觉的心理认同，就必须建立“一种具有共同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并“在（道德）领导权中有一个对现实的主导观念，使一切思想和行为贯穿这种精神并具体体现在全部教育、宗教、团体的机构工作中”^[28]。这种“领导权”必须是自觉的、普遍的，深深扎根于思想深处，并内化为党的执政伦理意识。共产党强调政治的道德伦理的一面，并始终把无产阶级的道德和知识的领导放在重要的地位。这既是历史经验，又是时代要求。要履行执政职责，完成执政使命，就必须取得对道德文化的领导，从而获得“领导权”的绝对权威，并在各种思想的交锋中，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普遍的形式”，进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形成一种“共同体情感”，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达到社会各阶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团结；在深度和广度上体现执政伦理意识，兑现执政伦理承诺。这就要求党要充分利用一切合法性资源，在实际工作中贯彻道德文化领导权理念，取得“完整”的领导权，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构建“有机”的“和谐”社会和国家。在领导道德文化建设中体现党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一致，体现党为民执政的理念和执政远见。

三、执政党道德建设是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

1. 道德属性与党性。

党性是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政党是具有意志的道德实体，道德属性是政党的“灵魂和根本，是党应有的品质和精神风范”^[29]。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道德属性上，它“体现与表达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价值维护度和理想追求”^[30]。现代政治是传统政治的继承和发展。在对执政主体的德性要求上，尽管具体的内容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其时代特点，然而，在对“价值合理性的绝对权威”的认知上、对“善”的追求上是不变的。

道德主要探讨价值关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充满道德感召力的价值理论体系,它以对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批判为始,科学地预设了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远景,并把该目标的实现作为党的道德义务和道德目标。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围绕政治权利进行政治运作。为了取得合法性,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各政党无不例外地祭起伦理道德的大旗,声称具备公正、廉洁、民主、人道等道德价值属性,这成为政党的“共相”。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越性不在其动听的伦理道德许诺,而在于其伦理道德是建立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非虚幻的道德说教和功利意义上的价值需要。政党的道德属性是共有的,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德属性是最“优良道德”,这种道德是“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代表着未来的方向,“具有体现和认知人类内在本性的”,^[31]并由于可实现性而具有真实性。

道德的学说可以视为一种义务论。共产党的政治道德,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为一种需要,一种“天然”的义务,是道德律使然,同时将其作为目的而有所趋赴,并倾其心,竭其力,从而成就“道德”。“无私利他是最高的道德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性最纯正最崇高的表现。这种道德心理规范的天然性来源于党的阶级性,党是工人阶级、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具有天然的革命性和大公无私的政治品格。一个政党要具备党性意义上的道德,必须使党的各种构成要素和特征,从价值理念到政治实践,从组织制度到运行机制,从党的集体到个体党员彻底地道德化,形成一个具有崇高形象的人格化的道德的集合体。人格化的党的道德品格,是党的“内在精神和道德品质的统一”,是党的价值追求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统一,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是道德本体与道德实体的统一。这就要求,党在政治实践中时刻以道德主体的身份出现,切切实实践行着“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道德承诺。经过长期内化,便会习惯于“对自己所立的道德法则的自觉遵从”^[32],便会使共产主义道德扎根于心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实现党性和德性的统一。

2. 执政党道德建设与执政伦理意识的自觉。

执政伦理意识,是党对作为先进性的政治组织,面对执政要求所应具有的道德伦理倾向和特征的态度和理解。加强执政党道德建设,体现了执政党执政伦理的理性自觉。

成为执政党后,党担负起领导国家建设的重任。权力的掌握和地位的变化,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33]一些党员干部党性意识不强,理想信念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党内,同时,“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34]。执政党的道德是“党治理国家、整合社会的伦理基础和道义基础,体现着党治理国家的道德水平,是否具备良好的执政道德,不仅关系着执政党的形象,而且关系着党的社会秩序供给的有效性”^[35]和合法性。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党内的腐败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声誉,自损党的合法性基础。

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道德建设,不仅将其视为巩固执政地位的需要,更从执政伦理的高度看待、处理党的道德建设。党的执政伦理意识的自觉,首先表现在党对自身的执政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它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基于使命和责任,党提出“以伟大的工程推进伟大的建设”,把党的先进性建设置于时代的潮流和民族复兴大业之中。其次,自觉体现在党的基本的执政伦理理念上,它以为民执政作为执政伦理的核心价值观理念,它把“文明与治国方略和执政道德联系在一起”^[36],对权力来源于谁和“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有着明确的认识。再次,对当前的党内状况,党有着清醒的认识,它既认识到“不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可能丧失的危险”^[37],又认识到党内的不良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土壤,认识到党的建设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从而认识到党的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此外,党执政伦理的自觉性还表现在,党把道德建设放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它自觉地按照政治伦理化的执政逻辑,遵循着价值思维的原则,自觉地把政治实践活动置于正义与道德的价值观念之下,提出“以德治国”的伦理承诺。最后,自觉还表现在党的道德建设实践上。从党章的修改,党代会的报告,再到具体的党内规范性文件,既可以看到党进行道德建设的决心和气魄,还可以看到执政党的道德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走向;既可看到执政伦理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又可看出执政伦理的“现实目标与现实尺度”。

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是党的先进性的彰显,是历史的召唤。能否解决这一问题,事关党的执政地位,事关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党将用执政实践回答这一历史性问题。

【参考文献】

- [1] [11] [16] [31] 戴木才. 政治文明的正当性 [M].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2, 197, 67, 151.
- [2] 庄锡福.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伦理准则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 (3).
- [3] 李明辉. 论廉政的伦理内涵 [J]. 伦理学研究, 2005, (5).
- [4] [30] 黄明哲. 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的若干思考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版), 2005, (4).
- [5] [10] [12] 任剑涛. 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 [J]. 政治学研究, 2000, (3).
- [6] [19] 任剑涛. 伦理政治研究 [M].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33, 83.
- [7] 刘泽华.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M].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50.
- [8]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 [Z].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491.
- [9] 江雪莲. 关于政治伦理化问题的思考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0, (6).
- [13] 徐大同. 西方政治思想史 [M]. 天津教育版社, 2003. 27.
- [14] [21] 张博颖. 试析中国国家主导的公民道德建设之合理性 [J]. 伦理学研究, 2005, (5).
- [15] [法] 马克·夸克. 合法性与政治 [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
- [17] [美] 李普塞特. 政治人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55.
- [18] 张恒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1).
- [20] 王长江. 当代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56.
- [22] [27] [意] 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人民出版社, 1983. 242, 335.
- [23] [28] 毛韵泽. 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 [M]. 求实出版社, 1987. 160, 169.
- [24] 杨楹.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 [J]. 学习论坛, 2005, (1).
- [25] 杨楹.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合法性及执政伦理 [J]. 集美大学学报, 2005, (3).
-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C]. 人民出版社, 1995. 93.
- [29] 张华龙. 先进性学习读本 [M]. 言实出版社, 2003. 3.
- [32] 王泽应, 贺志敏. 政党伦理中的执政主体德性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5, (2).
- [33] [37] 江泽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人民出版社, 2002. 3, 13.
- [3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建设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01-10-8 (1).
- [35] 郭广银, 李克海. 和谐社会与执政道德建设 [J]. 南京政治学报, 2005, (6).
- [36] 孟晓驷. 和谐世界理念的文化意蕴 [J]. 新华文摘, 2006, (3).

(本文责任编辑 谢莲碧)